



## 維新派體育思想初探

蘇瑞陽／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研究生

形象」，一下子成為外人眼中的「病貓」，帝國強權的入侵已難倖免。

十九世紀上半葉，滿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，已顯現衰危的趨勢，對內而言：土地的高度集中與貧富差距日益嚴重，造成不滿情緒日增，給予反對力量凝聚的空間，會黨廣泛的發展，「天地會」的勢力遍布南中國；對外而言：外國商品和走私鴉片的大量輸入，造成國家、社會經濟日益枯竭，民膏民脂被吸食殆盡。

而在中國社會的上層，卻仍在麻木不仁的歡慶昇平，一般的知識分子仍咀嚼著八股條文，幻想擁有一「黃金屋」與「顏如玉」的機會，整個局面已呈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，中國即將遭逢史無前例的悲劇，自此逐漸拉開了序幕。

清廷雖瓦解了「太平天國」，壓制了「天地會」的發展，但1840年鴉片戰爭的慘敗，中國的「老虎

至1894年，國人眼中的倭奴——日本，竟然在甲午之戰中，把中國打得一敗塗地，帝國強權的奴役中國，自此更是變本加厲，割據、賠款、領事裁判權、駐兵……等喪權辱國條款，使中國面臨危急存亡之秋，沉重的民族危機，激起有識之士強烈的憤怒與同仇敵愾之心，因而出現了一連串的愛國主義救亡高潮，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，正是社會不同階級所做出不同反應。維新派的愛國救亡的改良運動，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，對近代中國的政治、經濟和文化教育的發展，均有巨大深遠的影響，體育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，自然亦在改良之列，尤其在思想的啟蒙與西方體育的引進上，更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。

一、維新派代表人物

1. 康有為(1858——1927)··

原名祖貽，字廣廈，號長素，廣東南海縣人。初受業於名儒朱次琦，喜好陸、王之學，鄙棄程、朱。

為維新派思潮的主要人物與戊戌變法的領導者，其體育思想和主張，反映在變法前後的幾次上書、部分奏摺及其主要著作「大同書」中。(註1)

2. 梁啟超(1873——1929)··

字卓如，號任公，別署飲冰室主人，廣東新會人。六歲讀經，八歲能文，曾從康有為學「新學」，光緒二十一年馬關條約簽訂之時，隨康有為等上書清廷，要求遷都抗戰、變法圖強(此即著名的「公車上書」事件)。其體育思想與主張，散見於主編之「時務報」與其所創辦之「清議報」、「新民叢報」、「新小說」等刊物中，戊戌變法期間，曾主持清政府譯書局，引進西方學說，對新思想觀念的啟發，影響甚為深遠。(註2)

3. 譚嗣同(1865——1898)··

字復生，號壯飛，湖南瀏陽縣人，為戊戌六君子之一，激進的愛國主義者。其父曾官至湖北巡撫，但其無意於功名利祿，除刻苦專研學問外，尤好習武，授業於「大刀王五」王正誼門下，十九歲時浪跡江湖

，十年間遊歷十三省，深深體會民間疾苦，為後來獻身變法，抱著「殺身滅族全族不惜」的決心，致力於中國之救亡圖存埋下契機。從其獄中題壁詩「望門投止思張儉，忍死須臾特杜根。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相留」中，可見其慷慨就義的決心。其體育思想的核心是「反靜主動論」，思想與主張見於其所撰之「仁學」一書中。(註3)

4. 嚴復(1853——1920)··

為清政府第一批派往英國的留學生，主習海軍，但對當時流行的人文學科有相當濃厚的興趣，下苦功加以研究，歸國後翻譯了赫胥黎「天演論」、亞當史密士「原富」、斯賓塞「群學肄言」、約翰穆勒「群己權界論」與「名學」(前半部)、甄克斯「社會通論」、孟德斯鳩「法意」、以及耶方斯「名學淺說」(編譯)等著作，由於其功能以最典雅的古文譯出西學，而成為西方思想的最大權威。其體育思想與主張，運用其所譯之西學加以闡述，對國人思想觀念的啟迪，尤其是對知識分子的影響，功不可沒。(註4)

二、維新派思想與主張

康有為等一方面猛烈批判封建倫理道德思想和學術文化，一方面批判洋務派的「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」的主張，沖破了傳統禮教和文化專制的樊籬，公開

宣揚西方文明之優，力倡效其富強之道，給傳統社會帶來相當大的衝擊。茲就其思想與主張中，對體育觀念與作為其影響者，整理分述如下：

(一)動以興國、動以養生、主動反靜、求新求變的主「動」、主「變」的體育救國思想：

明治維新後的日本，整個國家充滿軍國主義武士道的色彩，在甲午戰後，這種軍國主義的強兵強國思想，康有為深受影響，其「西學」大都是向日本學習而來，他曾說：「今我有日本，為導向之卒，……我盡收其利而去其害」（註5）。

康有為在1895年「上清帝第二書」中，批判了程朱理學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」、「事物永遠是靜止的」等靜以處世、靜以養生的思想弊端，他把國家喻為人身，指出靜則朽，動則新，破除了閉關自守的頑固思想，顯現了求新求變圖強救亡的積極意識。

梁啟超更急切的強調「變亦變，不變亦變」的非變法不可的改革決心，他說：「凡改革之事，必除舊而布新，……。」指出除舊與布新，必須同時使力，方能破除積弊，變法有成。

譚嗣同在「仁學」一書中云：「日新為乎本，以太之動機而已矣。一切物質進化，罔不由於動，……西人喜動而霸五大洲，馴至文士，亦尚體操，婦人亦

侈游厲，此其崛起如何矣。……故靜與情，皆愚黔首慘術而擠之於死地也。」其徹底揭露了封建理學害人誤國之弊，並激勵人民尋求新的強身強國的道路。

嚴復於1895年天津〈直報〉上發表的〈原強〉一文中，更明白指出只有運動才能強身，而強身是完成一切事物的根本，「蓋一國之事同娛人身，今夫人身逸則弱，勞則強，固常理也。形神相資，志氣相動，有最勝之精神，而後有最勝之智略。是以君子小人之事，均非氣體強健者不為功。」其形神相生、志氣相動、逸弱勞強的主張，對當時不重視身體鍛鍊的士大夫言，不啻如暮鼓晨鐘，發人深省。其又在〈天演論—矯性〉譯文的按語中，對我國古代由「武健俠烈」演化為「變質尚文」深感隱憂，並在文中特別指出擊球、挾彈、拔河、舞劍諸戲，可以「于血氣精神有鼓蕩發揚之效」，宣揚了體育對人的身體、精神都有鍛鍊鼓舞的作用。

維新派以新的理論體系，藉犀利的文筆與透徹的說理，加上積極躬親的實踐，把宋明以來主靜的養生與處世思想，批判得毫無招架之力，更為西學的引進，掃除了障礙，也使近代體育的發展，開擴了更寬廣的空間。

(二)積極進行教育改革，以培養德、智、體三育並

重全面發展的人材：

我國自宋代理學興起後，教育以德、智為主，講求格物致知、誠意正心之學，南宋朱熹甚嘗言：「讀書人若逐日無事，有現成飯吃，半日靜坐，半日讀書，如此一二年，何患不進。」在如此觀念下，所培養的讀書人，往往登山則氣迫，涉水則足脛，僂身俯首，纖纖素手，不僅身體羸弱，且缺致用之學。

維新派最重視教育之改革，在「百日維新」時期，康有為所擬有關教育改革的奏摺，計有六十八件之多。可見教育改革為維新運動之最主要政策。其主張為廢科舉，興新學，三育並重：梁啟超在「變法通議」中說：「變法之本在育人才，人才之興在開學校，開學校之立在廢科舉」。其1896年制定的〈湖南時務學堂學約〉中，在攝身方面有「飲食作息有定時，勿過勞，重體育鍛鍊」，近代中國「體育」一詞，此可能為首先提出者。

譚嗣同在「報貝元征書」中說：「故夫廢科舉，誠為旋乾轉坤，轉移風氣之大權，而根本之尤要者也。」康有為更在其所著〈大同書〉中，敘述其教育的理想，指出各級學院除德、智教育外，「要注意衛生體育的設備及環境布置」、「小學院……注意保健、遊戲、唱歌、跳舞……是時專以養體為主，開智次之

，令功課稍少而遊戲稍多，以動蕩其氣血，發揚其身體。」中學院和大學院亦應「修建體操場，游步園，操舟渚」「重視體操，以行氣血而強筋骨。」對體育之重視由此可見矣。

嚴復在「原強」一文中，嘗論及體育與智育之關係，「且至腦學大明，莫不知形神相資，志氣相助，有最勝之精神，而後有最勝之智略。此其理吾古人知之，故庠序校塾不忘武事，壺勺之儀，射藝之術，凡所以練民筋骸，鼓民氣血者也。」闡釋了身體健康為智力發展的基礎。其在1889年擔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時，即將體操列入課程之中，內容有擊劍、刺棍、木棒、拳擊、啞鈴、足球、跳欄、三足競走、跳遠、跳高、爬桅等項。學生之中，張伯苓、馬寅初成為積極倡導體育的教育家，前者更曾任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主席，對後來體育的發展有相當程度的影響。

(三)反禁欲、重人權的自然人性論與天賦人權的思想，促成個性與婦女思想上的解放，解除從事體育活動的思想的顧忌。

中國自漢以後，社會一直重文輕武，至宋明尤甚，人們鄙薄勞動肢體，崇尚雍容嫺靜，人前掀衣露體被視為可羞可恥之事，帝王愛好運動、娛樂者，常被史家視為惡德而載入史籍之中。十九世紀中期以後，



初期在中國出現的西方體育活動，被國人視為「蠻夷代邦」的「奇技淫巧」，難登大雅之堂，加上傳統禮教的束縛，自古唯我獨尊的民族強烈自尊心與優越感，西方的體育觀念與活動對中國社會並未造成明顯的影響。

而康有為以自然人性論的觀點，強調孔子之道就是本於「人性」，「循人之性以為道」，在《大同書》中提到：「人道無求苦去樂者也」、「聖人之為道，亦但因民之所利而利導之，……所以不廢聲色」，指出人欲非惡，壓抑人欲則非善。而譚嗣同在《仁學》中更強調「天理即在人欲中，無人欲天理亦無從發現」，批判了傳統封建理教壓抑人欲之非。在天賦人權、平等思想的提倡上，康有為《中庸注》中指出：「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；與民同之，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。」「人人性善，文王亦不過性善，故文王與人平等相同，……凡人亦可自立為聖人。」「人人既是天生，則直隸於天，人人皆獨立而平等。」以上思想主張，可說是對封建思想體系的一大革命。

(四)積極宣揚體育的社會作用，把體育作為強民、強兵、富國的最佳手段：康有為在《上清帝第三書》中提出「富國、養民、教士、練兵」四策，盛讚德國

以體育手段練兵之法，在「養民」中認為應重視體育以養成尚武之風。「若夫當列國爭強之世，尤重尚武。」

梁啟超在「變法通議」中提到：「國之強弱在兵，選兵不用醫生，任意招募，體之贏壯所不知，能用命乎？如是，則練兵如不練。」指出身體強弱是練兵的根本，突出了體育在強兵的重要性。嚴復在《原強》一文中論述體育在強兵中的作用：「今者論一國富強之效，而以其民之手足體力為之基，……古今器用雖異，而有待於驍勇堅毅之氣則同。」「蓋生民之大要三，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。……莫不以民力、民智、民德三種斷民種之高下」，「人民的體、德、智的全面發展，是一個國家的根本，本固則「民生可優，國威可奮」，而嚴復更把民力立於首位，可見其對體育的重視。

### 三、維新派思想對近代體育之影響

維新派其積極主動，求新求變的思想與作為，雖有如曇花一現般短短百日間，即已煙消雲散，然其對後世所造成的影響，卻是如影隨形的從後來的「新政」中日益顯現，尤其在對傳統的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，以及為強民強種的體育鍛鍊的提倡，為中國近代體

育的發展，產生如下的影響：

(一)民智日開，民性日漸由靜而趨動，為後來西方體育觀念與活動，種下了發展的契機。

(二)康有為等之學生，大都從事教育工作，維新雖失敗，但改革風氣已大開。

(三)體育課列入學校課程之中，正式納入教育體系。

(四)男女平權觀給予女性參與體育活動機會，禁纏足的結果，使婦女體能與健康日益提昇，致子女身心狀況大幅改善。

(五)把功利主義觀帶入體育之中，視其為強種、強兵、強國的手段，刺激後來保教、保種、保國的民族意識的覺醒，成為軍國民體育的淵源之一。

(六)其對舊傳統的嚴厲批判，與西方體育的積極引進，造成傳統勢力的反動，為日後「洋土體育」之爭埋下了伏筆。

註

1. 參見〈康有為的體育思想及其成因〉蘇肖晴 體育史論集(三) pp135--139
2. 參見〈文學詞點〉 pp226 文強堂出版社 75.12 初版

3. 參見〈譚嗣同與體育〉蔣松卿 體育史論集(三) pp140--144
4. 參見〈中國哲學簡史〉馮友蘭 pp313--314 藍燈文化出版社
5. 參見〈敬謝天恩並統籌全局摺〉或〈日本變政考〉康有為

參考資料

1. 〈維新派對中國近代體育發展的啟蒙做用〉劉秉果 體育史論集(三) 1987.11 pp123--128
2. 〈試論近代中國體育觀念的變遷〉譚華 體育史論集(三) 1987.11 pp129--134
3. 〈康有為的體育思想及其成因〉蘇肖晴 體育史論集(三) 1987.11 pp135--139
4. 〈譚嗣同與體育〉蔣松卿 體育史論集(三) 1987.11 pp140--144
5. 〈晚清體育思想之形成——以自強保種為中心的探討〉許義雄
6. 〈試論兵式體操之存廢〉許義雄
7. 〈中國近代思想史論〉李澤厚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79.08 初版